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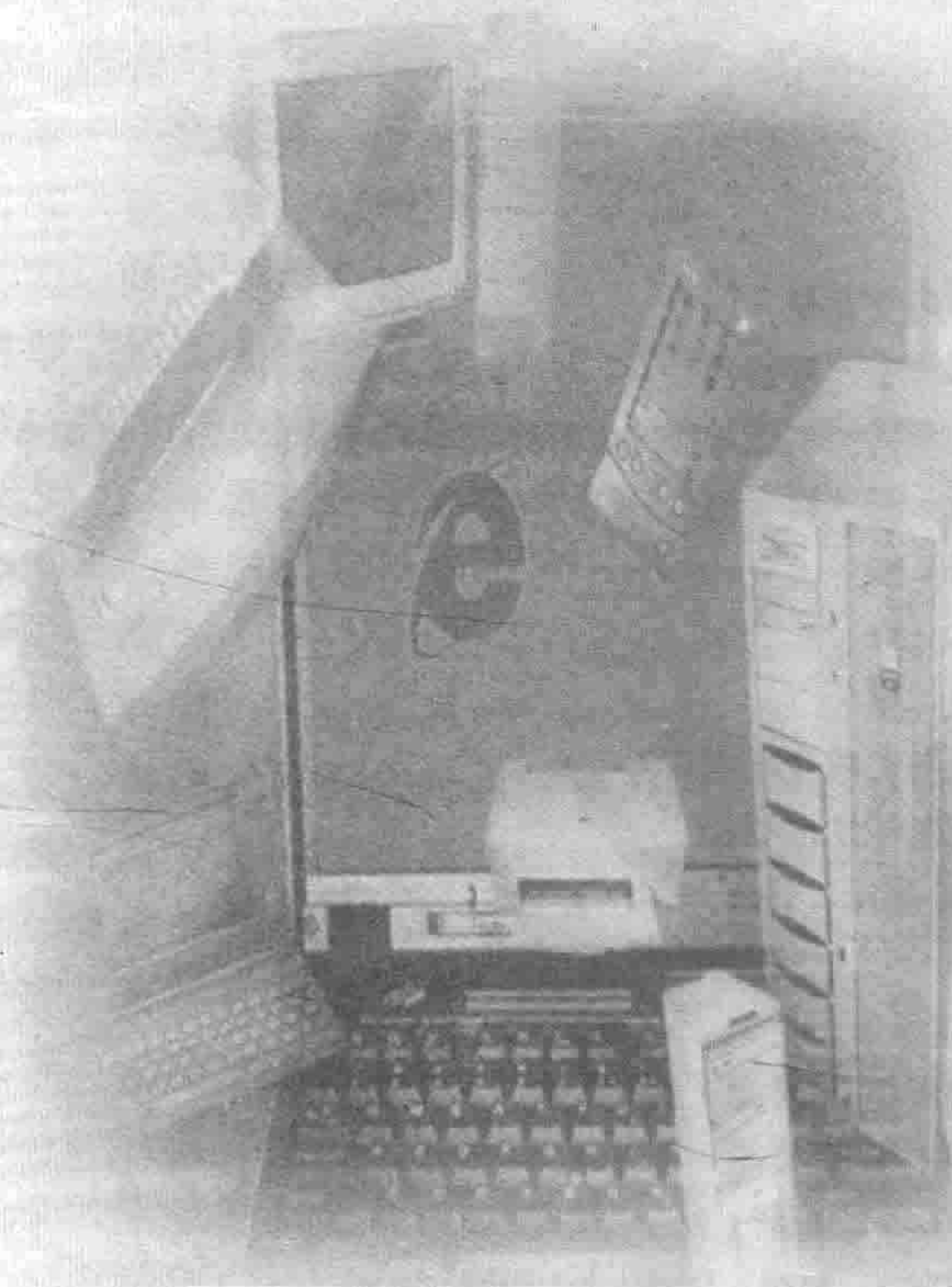
传播文化论

Chuanbo Wenhualun 郝朴宁 曾传虎 编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Chuanbo Wenhualun

传播文化论

郝朴宁 曾传虎 编著



云南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播文化论/郝朴宁,曾传虎编者. —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1.12

ISBN 7-5416-1595-1

I.传... II.①郝...②曾... III.传播学-研究
IV.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175 号

书 名:传播文化论

作 者:郝朴宁 曾传虎

出 版 者:云南科技出版社(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邮编:650034)

责任编辑:新 超 许 浒(特约)

封面设计:杨 峻

责任校对:水 红

责任印制:翟 苑

印 刷 者:云南省教育印刷厂

发 行 者:云南科技出版社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11

字 数:275 千

版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书 号:ISBN 7-5416-1595-1/G·205

定 价:23.00 元

若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新时代呼唤新文化·····	(1)
第一节 传播文化的历史点析·····	(1)
第二节 传播文化的现代冲击·····	(16)
第二章 媒介与文化·····	(49)
第一节 多元媒介与多元文化·····	(49)
第二节 经典媒介理论·····	(62)
第三节 媒介功能与媒介文化·····	(73)
第四节 媒介与文化流行·····	(84)
第三章 符号的文化与传播·····	(90)
第一节 汉字语言符号分析·····	(91)
第二节 影视语言符号·····	(125)
第四章 新闻与文化·····	(152)
第一节 新闻的文化认同·····	(152)
第二节 新闻评价的文化内涵·····	(162)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新闻文化观·····	(173)
第五章 舆论的文化导向与文化限制·····	(188)
第一节 舆论的形式演变·····	(188)
第二节 说服理论的发展与运用·····	(201)
第三节 新闻舆论的文化内涵·····	(219)
第四节 舆论的文化导向与限制·····	(230)
第六章 电视:大众文化的摇篮·····	(240)
第一节 魔匣子带来的生活·····	(241)
第二节 大众文化的摇篮·····	(249)

第三节	解构与结构	(261)
第七章	摄影艺术与广告文化	(269)
第一节	“象”的多元思维	(269)
第二节	时空辩证	(281)
第三节	广告的文化表现	(289)
第八章	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302)
第一节	文化与文化交流	(302)
第二节	文化的认知与冲突	(307)
第三节	跨文化对话	(317)

第一章 新时代呼唤新文化

当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时,人类也同时宣告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来得太突然了。在技术上,我们奋起直追;在观念上,我们忍受着挑战的伤痛,努力割舍着各种羁绊。我们拼命地学习着,甚至没有反思的余暇。

我们曾经落后,这使得我们习惯于将自己放在一种劣势地位去面对一切。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证明着我们正在强大起来,并且具有了同世界整个发展趋势对话的权利。这也要求我们在思考自我发展时,必须同世界发展的总趋势结合起来,我们不能再落后了。

第一节 传播文化的历史点析

信息时代的到来,是同现代传播手段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对于传播学的研究,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受众,在将这门学科定位于“新兴”二字的同时,而忽略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或者将自己历史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对于未来的关注。但是,在意识到今天对于明天的恒常性的同时,决不能忘记了昨天对于今天和明天的意义。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的深厚积淀,在对精神、生命和人类全部活动进行具体研究的过程中,也决定了自身的宏伟性和深奥性。文化的发展也正是从这里起步的,文化的价值认同也是由此产生的。当历史学家对其所研究的事件进行一种历史背景下的文化理解与估价时,其研究的内容也就完成了由文化向哲学的升华,具有了哲学的意义。

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为了补强自己,人类总是在尽一切

努力完善其对于周围事物的信息的接受能力和吸收能力,并不断改进和提高自身信息的传播速度和清晰度,使传播手段更加丰富并促进人类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这种努力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创造条件对在他面前可能潜伏的种种危险心中有数,然后也是为了能和大家一起看到共同对做这些危险的可能性”(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第4页)。

人类由其群居性所决定,是通过信息(包括人类进化完成前的信号)的传递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信息,则是同人类社会的产生同时起步的。社会作为群体的集合,无论规模大小,形态如何,都离不开横向和纵向的信息传播。传播是人类得以组合成社会的粘合剂。我们的祖先曾以“结绳记事”的方式贮存信息。《周易》曾被视为预卜吉凶的秘符,但其中却用“—”和“- -”两个符号及其奇特的组合,构成象征不同自然现象的八种图形——八卦,展开了早期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我们的祖先在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情况下,设计出了烽火台传递紧急军情。统治者观诗以了解民情,甚至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观测社会风气。日用品价格上涨,则意味着民风淳厚,社会风气好;反之,如果奢侈品价格上涨,则意味着民风奢糜,社会风气不好。表现出对于社会信息的关注,并以此调节自己的行为。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的科学发明,也是同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紧密相关的。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有两项是直接关系到信息活动的。纸的发明,使信息的存贮与传递在效率上得以大大提高;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印刷质量与效率,同时,也为信息传播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手段,将人类的信息活动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的祖先也已经意识到了利用信息,来增强活动的目的性。刘晏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39岁时开始为唐王朝从事财政工作。任期23年,其财政工作极见成效,这同他大抓信息是分不开的。“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

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轻重,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旧唐书》)。刘晏“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觐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贱之忧”(《资治通鉴》)。刘晏工作的成效,同他设立的信息网有密切关系。上面的历史材料告诉我们,从全国各省的巡院到京城,刘晏以优厚的待遇特招了一些走路快者传递各地的市场信息,以掌握各地的物价情况,即使是边远地区,其情况变化也能在几天内知道。这样,货物的调剂、分财布利、平抑物价,都可以有效地控制与掌握。既保证了朝廷能够获得优厚的利润,也使物价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建立有效的信息网络,和抓住物价信息这一中心环节,能使其工作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刘晏不仅善于抓信息,更善于利用信息。这一方面表现在根据信息来调剂余缺丰歉,“诸道各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雨雪丰欠之状白使司,丰则贱糴,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半处卖之”(《资治通鉴》)。另一方面,就是运用信息为减免赋税的决策提供依据。各地知院要及时将灾情进行上报,使他对各地灾情能够充分了解,到时不等下面申请,他就已经提前奏请皇帝同意,给予相应的减免赋税或救济,“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保证了工作上的主动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信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清朝康熙皇帝,为运用信息治国安邦,建立起多渠道的通信网络体系,该体系内有十种通信渠道:(1)直隶各省行政系统,以了解政治、经济、民情发展变化的信息,并连同气候变化,定期上报;(2)各省专设言官,以收集吏治政事的信息;(3)亲自巡视察访;(4)地方官员定期进京汇报辖区情况;(5)派遣临时钦差大臣进行专访;(6)在特殊地区安插“耳目”,以获取该地区各方面的信息;(7)组建各种临时“调查组”;(8)专题侦探;(9)鼓励密奏;(10)建立完善的驿站系统。这一信息网络就比刘晏的物价信息网络要庞大得多了,所获取的信息面也广泛得多。康熙能够创造出中国封建末世的最后

“辉煌”，同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祖先在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情况下，其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疾足与驿马去完成。《周易·系辞》中就有“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车，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夏本纪》上也有“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犂”的记载。可见，在秦朝以前，信息的传递主要是通过舟车完成的。到了秦朝，称传递信息的车为“传车”。秦汉以后，由驿马完成，称“驿骑”。“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由于是人工传递信息，为了保证传递线路的通畅，自西周开始，“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这里的“郊”、“井”、“舍”均为驿骑进行人马修整的处所。战国时代设有邮驿，供驿骑歇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出现了我国交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治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大道宽五十步，两旁植树，江河之岸修有高而宽的甬道，交通极为便利。汉代各地道路每三十里修一驿站，以便停歇。唐代又特设水驿，内备车、船、马。宋代每隔十里设一邮铺，有专职铺卒传递信息，大道之上，设有马递铺传递信息。到了明代，这种信息传递系统更加完善，各地不仅设有驿站，而且配置有各种人夫、马骡、车船以及传递文书信息的人员，并开始出现了民间专门传递信息的机构。清代邮传制度除官方的“驿”外，军界也设立了专门的网络“站”。

进入 20 世纪，随着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信息传递加工处理的手段也日趋完善。1906 年设立了邮传部，统辖轮船、铁路、电报、邮信四政，对信息传递实行统一管理，加速了我国信息业的发展。而现代交通工具的突破性发展，对信息传递速度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闻事业的全面起步，对于改变和完善人们的信息意识，更是产生出重要的刺激作用，大大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到了 20 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后，现代电讯传播技术与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将我国的信息活动推向了一

个全新的时代。

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是同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这种发展的突出特点是,随着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变革而引起信息革命。就整个人类的信息发展而言,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五次革命。其中第一次信息革命以语言的产生与数观念的形成为其特征;第二次信息革命以文字与纸的产生为特征;第三次信息革命以印刷术的诞生为特征;第四次信息革命以现代电子传播技术的运用为特征;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五次信息革命,是以电子计算机与通讯卫星为特征。就其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的信息活动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们的认识空间与思维空间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

在第四次信息革命中,人类传播手段中的视听技术,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第五次信息革命,则是电子计算机正以迅猛的态势扑向社会的各个领域。“信息高速公路”的崛起,标志着新的一次以多媒体为特征的信息革命已经到来。所谓“信息高速公路”是指高速计算机通讯网络,即信息社会中巨大的信息传输处理系统。它可以将国家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图书馆、企业以及家用计算机连接起来,使全国的计算机用户能够利用其终端设备,非常方便地传递和处理信息,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它以光纤通讯为基础,每一台计算机都可以入网。“信息高速公路”最大的特点是双向传播、互动沟通和个人化服务。而多媒体是指:把人类耳闻、目睹、鼻嗅、口尝和触摸所获得的现实世界的感觉,利用人工的方式复制出来,所复制出来的虚拟的现实,能够实现人感觉的全环境。目前的“信息高速公路”还只是多媒体的初级阶段,具有非常远大的发展前景。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对原有的电子媒体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怎样将高科技同视听艺术结合起来,是电子媒体正在思考的问题,并开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如 70 年代后期引起空前轰动的美国影片《星球大战》,就是大量采用了尖端科学的成果。80 年代的美国影片《终结者二号》,则使“计算机图像技术从一般的游戏上升为明星”。90 年代

狂扫世界票房的《侏罗纪公园》，进一步确立了计算机在未来视听艺术中的地位，把人们引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梦想时代。

人类的活动行为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人类的信息思想也是同人类的信息活动与信息意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诗经·郑风子衿》中有“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音’谓信息也”。（余冠英）“阳气极于上，阴信萌乎下”（汉·杨雄《太玄经》）。其中“信”，即有信号、消息的意思。唐代诗人李中的诗句“梦断美人沉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其“信息”一词已明显含有消息、音信之意。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古人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时，已经带有较明确的信息意识。在周文王时代，曾遇大旱，为解决物资紧缺的困难，特发文《告四方旅游》，“于是，告四方旅游。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旅游，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莫。间次均行，均行众从。积而无脱，以罚助均，无使之穷。平均无乏，利民不谣”（《逸周书·大匡》）。可见，周文王已经知道通过信息的传递，加快商品流通，以缓解供求矛盾，安定社会。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后，便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灭，走狗烹”，毅然弃官经商，号陶朱公。他用“计然七策”经商，颇见成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知斗则备修，时用则知物”，即预知要打仗，就应该厉兵秣马，以为备战；从年岁的丰歉和季节水旱的变化，预知各种物资的供应状况，以备无患，明显带有把握信息的色彩。他同其师计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夫粿，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粿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矣”（《史记》）。这段话不仅包含了丰富的经营思想，同时也强调了价格是重要的经营信息，价格变动会对整个市场产生极大的影响，告诉人们要注意价格变动的信息。此外，对于价格的预测，他也有其独到的见解，提出了“无敢居贵”的思想，因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即预

测价格的依据是市场的供求状况,同时应该考虑价格对于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影响作用。被后世工商业者奉为祖师爷的白圭,其主要的经营特点,也在于“乐观时变”,即特别强调了对于信息的收集与把握。

至于在大量保存下来的古代兵法中,其对于信息的认识,无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我国广大人民非常熟悉的《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只有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信息)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才能战之能胜。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连自己方面的情况也不了解时,则战而必败。“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分析了战争中各方面信息的重要性,对于任何信息的不“知”,都会造成战场上的失败。“不知彼我之情,陈兵轻进,意虽求胜,而终自败也”(《十一家注孙子·形篇》)。凡此种种,都在强调着信息的重要性。

既然信息对于战争有如此的重要性,那么怎样去收集信息呢?对此,我国古代兵法中也有详尽的阐述。《孙子兵法》中有:“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本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指出了在各种情况变化中,去获取与破译信息。“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群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吴子·料敌》)。

这里指出了通过一些表面现象,去把握实质性的东西。“武王问太公曰:‘吾欲未战先知敌之强弱,预见胜负之征为之奈何?’太公曰:‘胜负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效在人。谨候敌人出入进退,察其动静,言语妖祥,士卒所告。凡三军说怪,士卒畏法,敬其将命,相喜以破敌,相陈以勇猛,相贤以威武,此强征也。三军数惊,士卒不齐,相恐以敌强,相语以不利,耳目相属,妖言不止,众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将,此弱征也。三军齐整,阵势已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以休,此大败之征也’”(《六韬·兵征》)。这里所强调的也是怎样通过观察去捕获敌情的信息。

我国的古代兵法中虽有一些神秘的色彩,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是非常重实际的。《孙子兵法》认为,要在战争中致胜,必须“先知”,但“先知”并非求神问卜,或教条式的经验,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依赖于间谍的作用。“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而知敌之情也。故用间有五: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间俱起,莫知起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者。生间者,反报也”。“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孙子兵法·用间》)。充分肯定了间谍在战争中获取信息的重要性。“凡欲征伐,先用间谍,觇敌之众寡、虚实、动静,然后兴师,则大功可立,战无不胜”(《百战奇法·间战》),“欲攻欲守,非知敌情,非谍间何以得之。得则胜,失则败,其机至微”(《投笔肤谈·谍间》)。重视间谍在战争中的作用,实际上是在强调信息的作用,它能使每一次战略行为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以

己之长,击敌之短。

我国古代兵法在强调获取信息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于原始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产生出二次信息。“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孙子兵法·始计》)。所谓“算”,即为对于已经获取的信息进行认真详细地分析,而其分析的结果,就是在原始信息的基础上产生出的二次信息。

我们的祖先对于信息是有着充分认识的,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起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是,作为思想,它还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特别是从完整的科学体系来说,尚存有很大的距离。这一方面同人类自身认识的发展历程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所以,现代信息思想与信息科学产生于 20 世纪,也是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支持分不开的。

人类社会进入到 19 世纪末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光通信被有线电通信所取代,后又出现了无线电通信技术,通信手段的日益革新,信息传递方法的日益完善,使人类社会的信息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人们尝到了信息的甜头,信息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从而也增强了人们的信息意识。为了更加有效地利用信息,从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一些科学家开始了对于信息的专门研究,信息科学从此起步,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与普及。

最早将信息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是美国数学家、贝尔电话研究所的申农,他从 1940 年就开始了信息论的研究。1948 年,申农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通信的数学理论》的论文,第二年又发表了论文《噪声中通信》,从理论上研究了定量描述信息的方法以及如何有效地传递、处理信息的问题,从而奠定了信息论的基础,成为信息论的创始人。在其论文中,他专门讨论了信源与信道的特性,阐明了通讯机理,并提出了通讯系统的基础模型:信源——编码——信道——译码——信宿。他用数字方法对信息

作了定量描述,提出了信息量概念与计算方法。信息是信号传输的内容,应该是能够量化的;而信源作为信息的来源,可以是任何物质对象,但信息不是物质,而是以某种符号或信号表现出来,称之为消息,它的形式是具体的、多样的,而它所转载的实质内容就是信息。编码则指将信息转换为信号的措施;“码”即按一定规则排列出的符号序列,而编排过程即为编码过程,它又分为信源编码与信道编码两部分。信道为构成信息流转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键问题是信道的容量,它关系到信息的传递效率。当信号序列由输出端输出后,须将信号重新还原为文字或图像,信号只有经过译码,才能成为接收者所需要的信息。译码是对编码的反转换。信宿就是信息的接收者。

与申农同时代的维纳,在研究了机器和生物中的信息传递、变换、处理和控制的一般规律后,提出了控制论,并发表了论文《时间序列的内插、外推和平滑化》与专著《控制论》,揭示了信息处理、利用与控制的一般原理。这样,控制论同信息论一起,就比较完整地构建起了信息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创立起一般系统论,把事物作为一个整体和系统来研究,运用数学模型和类比同构等概念去描述系统的结构与行为,从而得出适用于一切系统的模式、原则和规律,为信息科学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并为信息学的正式出台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

信息理论经过 20 世纪中叶的发展,逐步成为了一门相当完整的科学理论,克服了原有理论的局部性和片面性,并将其研究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化学、管理、心理学方面,原有理论越发显得不足。对信息的概念和实质、信源熵、信息量以及语义信息、有效信息、模糊信息等问题的研究就日益紧迫,要求有更确切的理解和论述,信息科学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

20 世纪 60 年代,卡尔纳普提出了语义信息的问题,即信源发生的信息所包含的意义。信息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当这一规定意

义用语言进行表述时,即为信息的语义——语言的含义。这样,信息量的计算就产生出了两个量值,即发送者信息的含义定量和接收者对信息的理解定量,这是原有理论所无法解决的。在此期间,贝里斯、高艾斯、皮卡德等人又提出了有效信息的问题,即信宿接收信息后所产生的效果与作用。信源发出的信息对于不同接受者,其效用与价值是不同的,因此,信息的效用问题又被称之为相对信息。这一问题的提出,恰恰暴露出了传统信息论的缺陷。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的德路卡、艾会克瓦等人又提出了模糊信息的问题,即信息本身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的特征。传统信息理论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必须用模糊数学和模糊集合理论来解决。模糊信息是由事件本身的模糊度的性质引起的,而模糊度则要运用模糊数学来测定。

就其信息科学的发展过程来看,至今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是信息论向各门学科冲击的时期。其成就为当时的许多学科带来了意外的希望,人们试图以信息论的要领与方法来解决本学科所面临的一些难题,并试图将其用于解决一些社会性问题,但收获不大。20 世纪 60 年代,是信息论消化理解的时期,表现在理论体系的构建上。研究的重点是信息和信源编码问题,噪声信道编码取得了重大进展,离散信源编码问题借助熵的定义,以最基本的形式得到了解决,信息论开始被推广使用。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是信息论向信息科学发展的时期,并真正提出信息学。由于计算机的广泛运用,人类通讯系统的能力迅速提高。同时,如何更加有效地利用和处理信息,也成了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现代电子技术,缩短了人类的时空距离,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信息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与共享。要求与理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要求面前,原有的理论显得是那样的可怜,这也使得有更多的科学家投身到了信息理论的研究中去。在这一阶段中,技术问题上即信息的传递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产生了新情况下的信源与信道编码定理,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各学科也更加自觉地将信息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实际的研究中去,其科学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文化。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可以进行多方位的认识和把握。由于生成元素上的差异,很难进行总体上的把握,虽然不少文化史与文化学的专著被加上了“世界”二字,但仍然摆脱不了分别介绍的结局。其实道理很简单,人类文化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是由许多子系统文化构成的。各子系统文化之间固然有其相融的因素在内,但其存在价值却是由其差异性决定的。个性的价值超过了共性,人类文化的辉煌也就成了一种差异性表现的灿烂。当然,对于文化的分类是有不同标准的,这里,我们试就东西方文化的构成差异进行比较,以认识文化构成对于人类传播行为所产生出的不同影响。

人类学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对各种形态社会的传播行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将文化类型划分为“高文脉型文化”和“低文脉型文化”。所谓“文脉”的本身含义是指上下文或文与文之间的前后关系,用于传播学的研究后,其内涵就演变成为:在某一社会的传播行为中,存在着一种强劲的制抑脉动,它使传播行为变得更加精密和有效。其中,“高文脉型文化”是指传播过程中制抑脉动较强的文化,而东方文化就是其典型代表。如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特别强调手段与方式的作用,许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模糊的“语言”进行传递的。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低文脉型文化”的范畴,其制抑脉动较弱,甚至近于不存在。根据他的分析,“高文脉型文化”中存在着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制抑关系,进入这一文化系统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认可某种共同的约束,并将此作为相互间沟通的前提。通常所说的“点到为止”,就是建立在长期相互接触,而勿需明言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有了这种共同的约束,有了来自定向的阶层与区域的制抑脉动,才会产生出勿需明言的特殊效率。而作为“低文脉型文化”的西方文化,由于更注重字面上的内容和意思,在公共场合受到来自社会的制抑比东方文化要少得多,其效率则显